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入选2016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我们在大别山上

马德俊◎著

(下卷)

巍巍大别山，铮铮红军魂

大别山儿女用无上的勇气、智慧与坚忍，谱写出一部伟大的革命史诗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入选2016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WOMEN ZAI
DABIESHAN SHANG (XIA JUAN)

我们在大山之上

(下卷)

马德俊◎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在大别山上/马德俊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 10
ISBN 978-7-5396-5681-6

I. ①我…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0778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策 划:朱寒冬

责任编辑:宋潇婧 王婧婧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657625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72.5 字数:1200千字

版次: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149.00元(上、下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下卷

第十三章 走向合作

一 南田决策

1937年7月14日,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和潜山战斗营营长易元鳌来到岳西县三区沙岭岗南田村,迎接从鄂东北转战过来的红二十八军军政委高敬亭。

南田村是现在安徽省岳西县主簿镇西边千米高峰屏峰山下一个高地山村。它原系霍山县南乡辖地,1936年1月划入新设立的岳西县三区头陀乡南田保,同年3月隶属岳西县第三区主簿联保。

南田,原名“南天”,地属淮河、杭埠河、淠河水系源头,是皖西南大别山中一个平凡的山冲,分布着几处自然村庄。当年西汉衡山国君臣及后来历朝历代的霍山县官员,从北边山外东淠河边的衡山镇南巡至此地,已是到了边境的南极。此处六县尖、天鹅抱蛋、牛角岭、屏峰山都是千米以上高山峻岭,登上顶峰好似登上南边的天了,人们口口相传,此地就叫成了“南天”。后来到清代,头陀戴氏族人到南天买了田地,戴氏族人指此处的田产为南边的田,简称为“南田”。“天”“田”音近,平时人们习惯叫南田,又把上冲田畈叫上南田,下冲田畈叫下南田。当地有个古民谣:“头戴金面山,脚踏两南田;有人识得破,能买万石田。”说的是这里山环水绕必有气,是一块必然要承载着重大事件的地方。

高敬亭这次到的是上南田,是一个仅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面对着一片大田。从大田穿过去往南一条山道,正对着岳西县三区区公所所在地蛇形岗。往右边山谷中有一条路,可以通往头陀、鹞落坪、大岗岭,高敬亭也正是

由这条路来到南田的。这正符合高敬亭选择宿营地的特点,看上去偏僻,暗地里又四通八达。

南田这一带 1929 年就有党组织在此活动;1935 年 3 月成立南田游击队,是红军便衣队的活动区域,人民对红军感情很深。在岳西县大别山革命历史陈列馆里,陈列着这样一张字条:

中国工农红军:

兹有霍山南田陈祥志自动捐献拥军大米两石系心平愿意
敬礼

一九三五年 舒霍潜便衣队队部(印)

这是南田人民和红军鱼水情深的实证。它不仅是个字条,而且是珍贵的革命文物。就是在这个南田村,另外一个农民陈敬书三年中先后为红军献大米两担,肥猪两头,银圆二百六十二块,并养护一名红军伤员,直至其伤愈归队。1937 年 6 月份,红二十八军从舒城转来几十号伤员,安置到主簿原、南田一带,这一带的甲山洞、瓢儿洞、龙王洞都做过红军医院,收治过红军伤员。南田一带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地域。

高敬亭带来的部队,散住在南田村附近。麦子剃了头,玉米没了牛。水稻正含苞孕穗,山芋和黄豆长得快有蹲裆深了。此时又是大别山区的青黄不接天,麦子吃完了,稻谷没上来,粮食奇缺。战士们有的采摘野棠梨和快成熟的杨桃吃。野果吃光了,大家就吃青南瓜、马齿苋、地米菜、细米蒿,还把山谷地块中快要成熟的玉米苞谷掰下来烤着吃。青玉米秸秆有的很甜,如同甘蔗,用牙啃去皮,生吃了,然后视面积大小和数量多少放上银圆,作为赔偿。

“进剿”皖鄂苏区的敌人三十二师及安徽省四个保安团此时也在往这一带集中。附近的村庄,断断续续听到些冷枪声,远处不少村庄的屋脊冒出了黑色浓烟。而四周的天空是晴朗的,蓝得耀眼,田野、山溪、小径少见人影,平静中又预示着,将要有重大的不平静的事件到来。

鄂豫皖十年红军革命的结尾,被压缩到了南田一隅。现在南田村成了

鄂豫皖共产党和红军的中心。

高敬亭的住地，是上南田村金钱三、金孝纯家。这两处房屋建于1910年左右，在南田村也算是高大宽敞之处。金家房东把留着准备过年的菜都拿出来招待客人了。有一碗是腌咸兔子肉，这是用窝弓打到的，放在灶间火塘上吊着，烟熏火燎，看上去漆黑一团，吃起来又香又脆。

何耀榜刚走到军政委高敬亭住的院门前，一个提着双环马步枪、腰插驳壳枪的交通队的战士，朝何耀榜笑着说：“何政委回来了？军政委在等你。”房里值班的队员听到了，立刻喊醒了军政委。

激烈的战争年代，保证最高首长的安全是必要的。交通队有着其他部队无法比拟的政治优势，他们和大别山人人敬仰的高敬亭形影不离。不单有政治优势，还有军事优势，每个人都是长短双枪，还有大刀，有手电筒，而且单兵作战能力强。这种非同寻常的部队对很多人来说具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神秘感。高敬亭出门已形成三个标志，一个是黑布抬椅，一个是手枪团和交通队组成的手枪部队，一个是他那小号官独特的军号声，使敌人闻风丧胆。

何耀榜一走进屋子就说：“军政委来了？”

高敬亭很快从黑布抬椅上站起来，以少有的热情，一把抱住何耀榜，好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何耀榜也拥抱着高敬亭，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向他身上蔓延过来，冲击着他的心扉，给他以力量。此时两人的情绪万分激动，似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少顷，两人松开手。何耀榜看到，分手九个月的高敬亭由于“脾寒”和肺病的折磨，再加上连日征战，脸显得蜡黄，额头也刻下好几道皱纹。

何耀榜对高敬亭说：“军政委路上辛苦了。我一听说手枪团二、三分队在鹞落坪战斗，估计一定是您过来了。我和易元鳌就赶来见您。”

大家坐下来。高敬亭看了看何耀榜和易元鳌，而后说：“我不辛苦。你们的工作很好，卫立煌三个月‘清剿’这样紧张，你们这里还可以隐蔽这么多的人……听陈明江说，你们接到了党中央指示信？”

高敬亭显得非常急迫。

何耀榜回答说：“信是没有，只有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口头指示

和党中央书记处的几份文件。”

高敬亭急着问：“指示，说些什么？”

何耀榜把王稼祥主任的口头指示复述了一遍，然后将姜术堂带来的以及从潜山工委获得的文件递交给高敬亭。

高敬亭认真地翻看着文件。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长征走后，只是接到红二十五军交通员零星指令，而没有方向性的指示。1935年8月曾通过皖西北特委给上海中央写过信，可也是杳如黄鹤。这是他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三年之后第一次看到中央文件，心情非常激动。他那种渴望上级指示的紧迫心情，现在的人无法想象。

西安事变后，坚持在大别山区已三年的高敬亭，这时看到最多的是国民党《扫荡报》。这张报纸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治训处处长贺衷寒创办并主管。1935年春，贺衷寒为了配合“追剿”的需要，将《扫荡报》报社迁移汉口。汉口《扫荡报》日出两大张，初印五千份。不久从上海购置了套色轮转印报机，陆续增印到一万五千份。由于报社设在武汉，鄂豫皖近水楼台先得月，“发行”得最多。高敬亭在转战的路上捡到的也较多。信息不灵，事物需要从反面获得论证，从敌方那里，才能零星获得信息。一次，高敬亭从交通队捡到一张《扫荡报》，看到有关国共和谈、两党共同合作抗日，以及全国的抗日战争已经爆发的消息，他似信非信。习惯对《扫荡报》上的消息正话反听、反话正说的高敬亭，还是看到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所做出的政策的调整。中共中央已放弃“反蒋抗日”口号，逐步明确地提出“联蒋抗日”和“逼蒋抗日”的口号，也看到国民党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既喜悦又震惊。蒋介石的反共先锋、十三太保之一的贺衷寒，没有想到他的报纸成了高敬亭的信息源。当时长征中的党中央是通过《大公报》和《山西日报》，为中央红军长征找到陕北的立足点。而三年游击战争的南方各省游击队，包括项英、陈毅等，都是通过国民党报纸获悉国共和谈信息的。《扫荡报》最初完全是为了“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须‘剿匪’”而办的，使命是扫荡国民革命征途中的障碍，辅助军事上的安内攘外工作。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序幕揭开，国共二次合作宣言发表。该报转变方向：“我们《扫荡》的矛头指向倭寇。”1938年10月，武汉撤退，该报告别读者的社论，出于郭沫若手笔。

最近几个月,高敬亭先后三次接到这样的文件和信件,要红军和国民党谈判,可是他认为那是假的。卫立煌派人送来的信条件很苛刻,只是叫红军投降,还说陕北毛泽东、朱德和红军已投降了。卫立煌派来送信的交通员被他处决了,信和文件也被他烧了。他不敢相信也不敢在根据地党和红军内公布,那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会动摇军心!除了与国民党军血战到底外,谁敢设想另外的前途?现在应该相信了,特别是现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鬼子打进中国来了,高敬亭已从各个方面感受到中国人民抗战救国的热情。高敬亭不断地对何耀榜说:“好了,我们有中央文件了,有根据,可以正式执行国共和谈了!”

在激烈的战争中,能否预防不利于己的偶然因素,能否抓住有利于己的偶然因素,并且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这是一个军事指挥员是否有智慧的试金石。

高敬亭在认真分析研究这批文件后,准备在鄂豫皖做出战略上和策略上的重大转变。他说:“王稼祥主任的指示是真的,党中央的提议是正确的,但国共和谈可不能投降。这几个文件不久前我在鄂东看过了,不过不是中央送来的,是通过地方党组织送来的,所以送来三次我都没有相信。你这个是中央送来的,又是从西安讨来的,一定是真的,精神我们还吃不透,叫陈明江来读给我们听听。”

在高敬亭住地,高敬亭、何耀榜、特委秘书徐文初、便衣队队长徐海珊、陈明江、唐元田,还有一位姓汪的巡视员,围坐在一张桌子前,听陈明江读文件。

陈明江把文件反复读了三遍,陈明江深知事情重大,他对文章中的字词语句标点符号都不敢有半点马虎,眼到语出。对文件中的“兄弟阋于墙”还解释了一番。高敬亭听完以后,说:“和我以前接到的文件意思是差不多,就是字句不一样,这次是真的,特别是文件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以及在和国民党谈判时‘要提高警惕,保持独立性,以免遭受不测’等,应该相信是中央精神了。”

何耀榜说:“军政委,我把这半年来皖鄂边的情况汇报一下吧?特别是黄冈大崎山战斗,我们已到了巴水河边,只是大河涨水,没有增援过去……”

“不用，陈明江已汇报过啦，大概的情况我已知道了。大崎山战斗，你们牵制敌人有功。现在皖鄂边还有这样大的力量，很了不起。鄂东北在卫立煌的三个月‘清剿’中损失不小。现在鄂豫皖的领导层，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啦。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在这个全国性的大变局中，一定要把各项工作做好。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都到陕北了，国共合作了，现在正在谈判。我们也试试，商讨同国民党谈判事宜，坚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我决定：从现在起正式与国民党鄂豫皖三省边区督办公署进行谈判。让大别山区红军实现国共合作，开赴抗日前线。谈，就与卫立煌谈判。”

合肥人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这时是督办大别山“剿匪”的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高敬亭是坚守大别山的红军最高领导人。“谈，就与卫立煌谈”，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

何耀榜听了高敬亭这番话，十分高兴。他问高敬亭：“国共和谈我们虽然有一些准备工作，但由于没有中央和您的决定，没有进行谈判。如果确定谈判，哪个地方比较合适？”

陈明江建议说：“这里就比较合适。我们在这里有些区乡联保工作。要是写信，可以送到我们门前三区蛇形岗的炮楼里，三区的区公所就设在蛇形岗炮楼下。蛇形岗炮楼站在我们门前的山头就可以看得见。信可以由岳西县三区区公所转递。不过，就怕敌人发觉高政委和何政委都在这里，要是被敌人包围起来，情况就紧张了，请你们考虑一下。”

1936年1月安徽省岳西县正式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当时岳西分三个区二十一个保。第三区区公所设在蛇形岗。区境主要来自霍山县第四区南乡九个保，包家河九个保，舒城县第六区三个乡，还有潜山县、太湖县几个保，经重新调整设置后，岳西县三区辖黄羊、沈家桥、主簿、马畈、白果、河口六个联保。全区面积六百九十五平方公里。区长为李德保，前面说过，他是个中共叛徒，原来的上海中央局派来的特派员、中共皖西北特委常委、宣传部长。但他叛变来到这里担任区长后，和红军便衣队暗中也有来往。

高敬亭说：“中央叫打着谈判，我听说你们把特务营、战斗营补充起来了，我也把手枪团二、三分队带来了。那么，你们就通知手枪团、特务营、战

斗营都到这里集合,和便衣队一道,先打响,再谈判。”

何耀榜说:“高政委,党中央指示不能把部队全部集中起来,这样容易被敌人围歼。国民党一向不讲信用,要流氓手段。我们要分兵作战,通知主力在外围作战,我们带领手枪团、交通队和警卫队在里面谈判,万一敌人包围我们,可以里应外合,也可以冲出去。另外,我和高政委两个人不能同时出面,敌人要是知道我们两个人在同一地方,必然用最大的兵力来捉我们,如果都被敌人捉去,谈判就无法实现了。”

高敬亭听了,对何耀榜说:“你的意见我完全同意,就这样决定。今天晚上,我先给卫立煌写一封信,明天派人送到附近的岳西三区,请他们代转。一定要卫立煌派代表来。其他具体问题,由你去布置。”

在南田村金钱三家里,有红军老战士回忆:高敬亭屋里的灯几乎亮了一夜。

高敬亭此时面临的局势是多么与众不同啊!谈判已不同于血与火的血拼,在这种斗争中既要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不能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大别山共产党人必须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做出正确的决策。

三年来,高敬亭和红二十八军与党中央、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都断了联系,想见个外面的人都难,人都傻了。除了打蒋介石还知道什么呀?在大别山孤军奋战的高敬亭,得到盼望已久的党中央的文件,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在召开会议并和何耀榜交谈后,他仍点着灯一遍一遍地看。看后坐在那里抽烟,或者站起来踱着步,就是不吭气。他在仔细体味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在1937年4月15日告全党同志书中强调指出,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革命已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其他中国内部的矛盾则处于从属地位。为此,党中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和“联蒋抗日”“国共合作”的主张。中央要求全党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面对党中央的指示,高敬亭既无比喜悦,又感到诧异、震惊。要和拼杀多年的对手握手言和,摆在他面前的工作真是既复杂,又难以判断……思考直到下半夜,高敬亭亲自动手给卫立煌写信。

高敬亭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名义，主动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战谈判的倡议。根据一些老红军回忆，信的大致意思是：“我奉我党中央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指示，向你提出：一、接信后凡驻我附近的国民党士兵立即撤退；二、双方派出代表进行谈判。”信中最后又强调鄂豫皖停止内战，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等。信中还表示了红军的严正警告：“我们的部队在这里，你们有本领的话，上来拿枪，你们把这支部队消灭，鄂豫皖的红二十八军还多得很。你现在就是去鄂东北把高敬亭本人捉住，二十八军的高敬亭还多得很，谁都能代替他。”之后，高敬亭又给岳西县三区李德保区长写了一封信，让他立即派人把信送给卫立煌。高敬亭唰唰几笔在信封上写了“岳西县第三区公所速交卫立煌督办收”，下款写“红二十八军缄”。

做出这个决定是何等艰难啊！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二十八军交通队是警卫部队，交通队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军首长的警卫工作。罗映臣，当时红二十八军交通队通讯班的班长。他回忆道：和谈之前的一天晚上，我值班时发现军政委房间的灯老是亮着。我下哨回来，见军政委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放下枪，推门进去，见桌子上放着一大沓书报。我催首长休息，注意身体。他停下脚步，对我说：“睡不着。”接着又说，“小罗，你睡吧，有些事你现在不明白，将来你会清楚的。”

当时年方十九岁的罗映臣，是随方永乐从鄂东北独立团过来的，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同时，红二十八军发布命令：手枪团、特务营、战斗营，各工委、游击队、便衣队立即行动起来，散发有关谈判的传单、标语，配合谈判，并提供外线情报。

高敬亭生在大别山、长在大别山，到现在他的足迹没有离开过大别山。在这个特定的时刻，高敬亭从一系列杂乱无章的、眼花缭乱的战局，相互交错关联的事件中综合出局势的发展趋向，在没有得到中央和上级具体指示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决定与国民党展开谈判，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素质。

高敬亭做出和鄂豫皖边区“剿共”指挥机关谈判的决定，并非是偶然的，

而是有着前兆和脉络的。

1932年1月10日,在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召开的鄂豫皖省委成立大会上,选举沈泽民、周纯全、高敬亭、成仿吾、汪友卿、郑位三、耿显义七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沈泽民当选为省委书记。沈泽民做工作报告,“中国革命高潮,在日占满洲以后已达到一个新转折点,全国革命形势逐渐成熟,革命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同时日军侵略我国东北是“直接进攻中国革命和进攻苏联”,“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亦已成熟”。提出当前的任务就是“准备向帝国主义国家战争”。在鄂豫皖根据地就是“进一步向外进攻。依照中央指示造成红军在长江边、京汉路两旁行动自如的形势”。“准备造成更大的鄂豫皖整个赤区”与“湘鄂赣苏区打成一片,完成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因此,“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力量特别要注意向帝国主义的要塞(长江边和京汉路两旁)推进,红军主力的行动自然也要配合这个方向”。省委要加强党对反帝工作的领导,“迅速建立反帝的群众工作”。他说:我们最终要和侵略中国的日本作战,在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之前,要消灭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及其武装。这些话让高敬亭这个省委常委也进一步知道如何从国际国内形势来思考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

可是中国统治者蒋介石一心对内,一步一步从动员地区力量到动员全国力量“围剿”各个苏区,对鄂豫皖就有红四方面军时期的四次“围剿”、红二十五军的第五次“围剿”。日本陆海军则一步一步向侵略中国的目标迈进。不久后,就爆发了“一·二八”日本进攻淞沪战争、华北事变……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高敬亭虽然和中央、省委机关失去联系,又整天在深山密林里,但是高敬亭尽可能多搜集信息。他的交通队出山袭敌之后,就把收集书报刊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如国民党报纸说“共党徐向前部窜扰四川”,他就知道红四方面军到了四川,并在四川占了哪些县。他从敌人报纸上看到“徐海东部在陕南被全歼”,就知道徐海东和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南了,并以这些消息做报告,给部队讲形势,鼓舞士气。他对国际国内形势,基本上还是心中有数的。

再看看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争的轨迹,由内战走向联合抗日的脉络也是清楚的。

1934年6月,省委在安徽霍山县的团山召开省委会议,高敬亭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做出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共皖西北道委指示信第一号》。信中指出:“目前的中国正是殖民地道路和苏维埃道路的生死斗争”“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动员广大群众来粉碎五次‘围剿’,争取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的胜利。”

红二十八军初创时期,军、师政治部经常用油印刻印的红军布告、传单、口号等,宣传党的主张,宣传红军的战绩。当时口号内容仅有“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平分土地”“反对国民党苛捐杂税,拉夫抓丁”“穷人不打穷人”“调转枪口,打倒国民党”等。到了1936年初,高敬亭从报纸上得知“华北事变”的一些情况,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的一连串事件,非常愤慨。高敬亭在经过认真研究后,加强了抗日宣传,红二十八军所到之处,贴出的标语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主要突出的口号了。

1936年春天,高敬亭派便衣队队长汪少川,到皖西宿松一带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汪少川在宿松罗汉尖组织了一支二百余人的游击队,对外称“大中华抗日救国军”。3月,高敬亭亲自到罗汉尖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向全体人员讲话。该部一度发展到一千余人,这是红二十八军对外打出抗日招牌的第一支军队。这就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二十八军及便衣队在皖西和沿江一带的影响。

1936年6月两广事件和12月西安事变之后,抗日宣传更加明确了。1937年春在鄂豫皖红军小学编写的识字课本中开头就写道:“看到我中国发生战事多,青年都要动干戈,老幼受折磨,中日两相争又有蒋匪兵,鸡犬鹅鸭尽遭瘟,百姓不安宁。”课本最后写道:“努力去抗日又打蒋介石,大家齐心又协力,以后分田地。”这些都说明红二十八军是主张抗日的。高敬亭和红二十八军这些领导者们,光从受教育程度来说,文化水平都特别低,部队中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大知识分子,清一色的大别山农民,连初中程度都没有。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走后,这些“干干净净脱离了上级,孤孤单单在这一片广大的被破坏了的苏区内东爬西奔的领导”,并没有脱离人民、脱离社会,而是不断地搜集国内外情况,“偶尔从敌人的报纸上得到一星半点的消息”,根据

形势,采取措施。为了掌握形势,鄂豫皖在苏区外设有许多情报点,负责搜集安庆、九江、六安、合肥等地的各种消息和敌情动态。高敬亭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全国抗日高潮就要到来,红军要制定新的斗争策略。

高敬亭对应不应该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是经过反复考虑,并运用他巨大的权威一锤定音的。因为要和昨天你死我活的敌人进行谈判,是事关重大的问题,本应请示党中央批准才好,但当时他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无法直接请示,而如果久拖不决,又会丧失有利时机。高敬亭在同何耀榜商量,同皖鄂特委反复研究后,决定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以停止武装冲突;至于武装冲突停止以后,政治上和行动上怎样处理,需待党中央决定。

远处蛇形岗小街传来隐隐的狗叫,碉堡上的灯火还在闪烁。

交通队警卫班长万海峰身佩驳壳枪,在高敬亭住室外逡巡着。只要高敬亭一住下,万海峰总是不离军政委的住处,直到高敬亭房间灯花落了又开,开了又落,他才去休息。在大别山区,夏天的后半夜就开始凉爽了。这时,草和树上的露水很重,弯弓似的夜月已经落山了。高敬亭的住处,那盏油腻乌黑的灯盏还在亮着。

十三岁参军的“毛头”,后来由高敬亭起名,在红二十八军的花名册里,已叫作“万海峰”了。在此时万海峰的生命里,印象最深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东家放牛村里辱骂、殴打过他的地主;另一个是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二叔;再就是军政委高敬亭了。

7月15日清晨五时,东方发白了,先是一道微弱的白光,渐渐扩大,像一条银河躺在东边群山上,继而天边都变成了美丽的玫瑰色。已是警卫班长的万海峰知道,新的一天开始了,他把挎在身上的驳壳枪正了正,准备随时听从高政委的召唤。

山野十分沉静,四周传来小鸟的歌唱声。这时,万海峰听到高敬亭一声大喊:“万班长!”万海峰立即走进去。高敬亭对他说:“立刻安排人把这封信送到岳西县第三区蛇形岗炮楼去。我等信儿回来。”

万海峰派了三名精明强干的警卫战士,化装成当地农民,但腋下夹的、腰中插的有枪,护送交通员金孝广前去蛇形岗送信。

这段经历,对万海峰日后在处理一系列重大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战略

眼光,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为什么选择金孝广送信?

原来交通员金孝广就是南田村人。南田村居民不多,金家是老住户之一。金孝广和高敬亭所住房屋的房东还有亲戚关系。生于1915年的金孝广,十八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此时二十二岁,近一米八的大个子,身强力壮,熟悉当地情况,由他来送这封信是再合适不过了。后来金孝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1950年3月被评为全军人民功臣,由二十九军颁发人民功臣奖状,后退伍返乡,1966年病逝于南田村中。

金孝广送信出发后,高敬亭与何耀榜在屋里不停地踱步,焦急不安地等待着。

万海峰一千警卫自然紧随其后,左右不离地保卫首长的安全。

这时,高敬亭看了看万海峰说:“在谈判时,国民党肯定会一面花言巧语地保证我们下山后的安全,另一方面又会对我们施加压力,逼我们让步。你是班长,要多长个心眼,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时刻得保持与部队的联系。咱们大别山三千人马的命运,可就在这一两天的谈判中决定呐!”

“首长,请放心!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全力以赴完成保卫首长和部队的任务。”万海峰感到了心头的沉重。

如今的万海峰不是当年的“毛头”了,他已开始学会深度和全方位地思考问题了。他让警卫战士给大别山两位职位最高的红军将领送去一壶开水,便轻轻地掩上门,让首长们静下心来,思考大事。

二 送信蛇形岗

从南田村来的这封突然出现的信使敌人十分震惊……

高敬亭致卫立煌函件信封上写着:“岳西县第三区公所速交鄂豫皖‘剿共’督办公署卫立煌督办启”,落款为“红二十八军缄”。高敬亭不知道的是,这一天正是《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中央的日子。

时间上的巧合,往往也很有趣。当大别山在1937年春夏还在进行“清剿”与反“清剿”战争时,3月,中革军副主席周恩来和蒋介石的代表在杭